

高研院通讯

IAS Newsletter

第九期（2010年•春季号）



南京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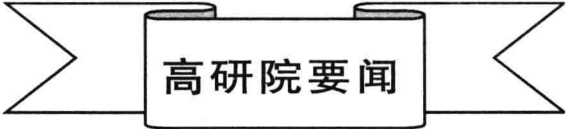
目 录

【高研院要闻】

- 孙江、王宁受聘为高研院特聘教授 / 1
- 高研院组建“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国与东亚”跨学科小组 / 1
- 高研院举行兼职研究员聘任仪式 / 2
- 台湾大学中文系康韵梅教授来院访学 / 2
- 美国匹兹堡大学代表团来访 / 3
- “近六十年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研讨会 / 3
- 高研院教授沙龙“妇女选举与性别平等” / 3
- 挪威奥斯陆大学 Frode Helland 教授做专题报告 / 4
- 第四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 4
- 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 2009 年年会 / 5
- 欧盟《里斯本条约》研讨会召开 / 5
- 高研院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做专题报告 / 5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演讲 / 6
- 台湾大学高研院林建甫、唐格里副院长来黄 / 6
- 著名画家、鉴赏家萧平先生演讲 / 6
- 英文刊物《南大评论》(Nanda Review) 创刊 / 6
- 许倬云先生为无锡的发展献计献策 / 7
- 首届“阿尔多瓦—南京论坛” / 7
-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学院

【名家讲坛】

- 黄帝自巴比伦来——中国人种西来说及其传播 孙 江 / 9



高研院要闻

孙江、王宁受聘为高研院特聘教授

2009年9月24日和10月27日,高研院先后聘任孙江教授和王宁教授为我院特聘教授。孙江教授为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现为日本静岡文化大学教授;王宁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两位教授受聘后将分别在高研院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等领域领导学术团队进行开创性研究。受聘当日,孙江教授和王宁教授还分别作了主题为“黄帝自巴比伦来——中国人种西来说及其在东亚的传播”和“国际 A&HCI 和 SSCI 期刊论文写作策略”的演讲。

高研院组建“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国与东亚”跨学科小组

2009年9月,高研院组建了“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国与东亚”跨学科小组,该小组以探讨现代知识的形成及其结构,构建对中国及东亚新的认知体系为宗旨,研究主题包括“中国的现代性:作为表象的现代中国”、“东亚的现代性:中国与日本近代知识的转型与互动”以及“关于现代性的比较研究”等。小组成员以高研院特聘教授孙江和驻院学者陈蕴茜为核心,吸纳了包括南京大学历史系、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院、文学院、地球海洋科学学院、建筑学院和法学院等众多院系在内的18名学者参与。该小组的工作计划主要有开设全校性“人文社

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概念史与社会史”选修课程、建立资料库和网站、邀请国内外专家定期举办近代知识讲座以及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有关刊物等。



高研院举行兼职研究员聘任仪式

2009年9月29日,高研院举行“高研院兼职研究员”聘任仪式,自2005年至2008年曾在高研院担任过短期驻院学者的20位老师先后从周宪院长的手中接过聘书并与周宪院长合影留念。受聘后的兼职研究员将在各自的单位继续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同时参与高研院的各种学术活动,高研院为他们举办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提供相应支持。

台湾大学中文系康韵梅教授来院访学

2009年10月1日至11月12日,台湾大学中文系康韵梅教授在高研院作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访学期间,康教授访问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域外汉籍研究所等单位,并与张伯伟教授、巩本栋教授、程章灿教授等学者进行了交流。11月2日,康教授还在高研院作了主题为“与爱睽违:《莺莺传》新论”的名家讲坛讲座。

美国匹兹堡大学代表团来访

2009年10月10日至14日,美国匹兹堡大学代表团 Thomas Rawski、Evelyn Rawski、Louise Comfort、Katherine Carlitz、Yun Peng、Cecile Chu-chin Sun 教授一行6人来访高研院。在此期间,他们与高研院领导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商谈,并就各自的专业领域问题与南京大学文学院、社会学院、历史系、环境学院等院系的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近六十年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由南京大学高研院与台湾大学高研院共同主办的“近六十年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5日至16日在台湾大学农化新馆五楼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是继2007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国际研讨会”之后,由两所高研院共同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学术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包括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中央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众多海峡两岸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近40名学者到会发言或参加研讨。此次会议期间,适逢许倬云先生八十寿辰,大会特别为许先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高研院教授沙龙“妇女选举与性别平等”

2009年10月19日,高研院举办主题为“妇女选举与性别平等”的第八期教授沙龙。沙龙由高研院副院长何成洲教授主持,特邀德国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馆长暨研究中心主任波维尔教授做主题发言,参加沙龙的嘉宾还有南京师范大学金一虹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唐正东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方红副教授等。本次沙龙还得到了南京大学马克思研究院和艾伯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挪威奥斯陆大学 Frode Helland 教授做专题报告

2009 年 10 月 29 日,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 Frode Helland 教授来访,并做主题为“跨文化戏剧中‘他者’的再现”的专题报告,演讲之后还与南大师生进行了交流。

第四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09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由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两岸三地人文社科论坛在南京大学开幕,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近 70 名专家学者围绕“灾害与公共管理”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教授、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瑞腾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冯通教授分别在大会上致辞。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教授和美国匹兹堡大学路易斯·康佛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有效应对灾害,创新公共管理》和《灾害恢复的动力机制——地震应急系统的恢复力与“熵”》的大会主题发言。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会学者分别就政府灾害管理制度、灾害应对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支持、灾后重建与恢



复、灾害风险的预警与管理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 2009 年年会

2009 年 11 月 7 日,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 2009 年年会在南京大学高研院召开,来自江苏省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30 余名代表提交论文参会。此次年会特别邀请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部夏东荣主任做主题发言,学会名誉会长钱林森教授和会长周宪教授先后在会议上致辞。本次会议除了围绕“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外,还召开了学会理事会,增补了常务理事和会员。

欧盟《里斯本条约》研讨会召开

2009 年 11 月 9 日,由南京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高研院和欧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里斯本条约》研讨会(EU Seminar: The Lisbon Treaty)在高研院报告厅召开。本次研讨会邀请了瑞典驻上海总领事 Bengt Johansson 先生、瑞典驻香港总领事 Lars Danielsson 先生、瑞典欧盟事务专家 Anna Michalski 女士和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 Antonio Segura 先生作主题发言。来自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历史系的多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就《里斯本条约》的影响和展望、欧盟的发展、东亚与欧盟以及欧洲民族国家等主题做会议发言。

高研院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做专题报告

2009 年 11 月 13 日,高研院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女士应邀做主题为“乾坤二卦研读”的专题报告。张连珍名誉院长长期在重要党政领导岗位上从事社会管理工作,对于江苏的文化教育事业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尤其是她本人对于文化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富有个性的研究,有力地带动了南京大学和高研院的学术交流工作的开展。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和部分省市领导也一起聆听了张连珍名誉院长的精彩演讲。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演讲

2009年11月23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在高研院名家讲坛做主题为“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的演讲,这是继张异宾教授、洪银兴教授之后第三位在高研院名家讲坛演讲的南京大学著名学者。

台湾大学高研院林建甫、唐格里副院长来访

2009年11月25日,台湾大学高研院副院长林建甫、唐格里教授来访南大高研院,双方续签了两院的学术合作协议,商讨了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的相关事宜。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还与两位副院长就加强南京与台湾的经济合作及举办两校金融论坛等事宜进行了座谈。

著名画家、鉴赏家萧平先生演讲

2009年11月26日,著名画家、鉴赏家、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故宫博物院特约研究员萧平先生应邀做客高研院名家讲坛,做主题为“扬州八怪的生平和艺术”的精彩演讲,获得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英文刊物《南大评论》(Nanda Review)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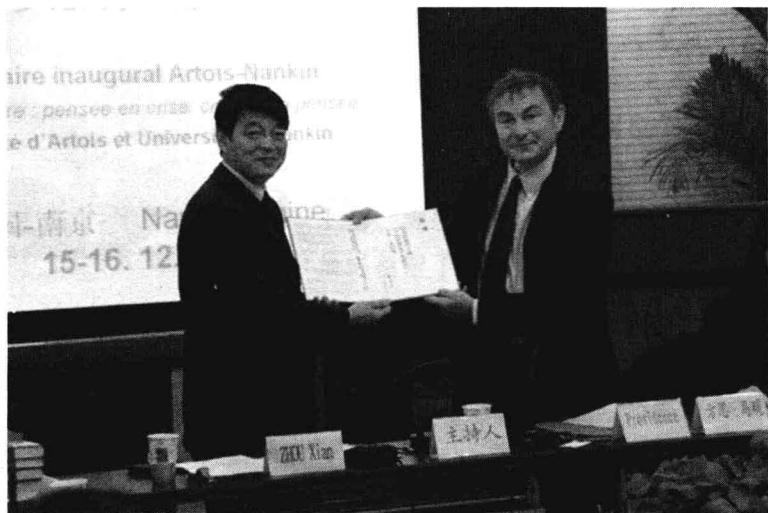
2009年12月,南京大学的英文刊物《南大评论》创刊。《南大评论》是推进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努力,它的主要目标是将南大学者通过对话和交流而激发的最新最顶尖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外界。第一期《南大评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主题:当代中国问题、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诉求、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集中了南京大学相关院系15人在专业领域的论文。

许倬云先生为无锡的发展献计献策

2009年12月11日,许倬云先生通过口述的方式对无锡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如何延续无锡的文化特色、如何兴建大型会议中心、文化中心及举办大型展览活动等,高研院将这些内容整理为第五期“信息通报”,并上报学校领导和省市领导以供参考。

首届“阿尔多瓦—南京论坛”

由南京大学和法国阿尔多瓦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阿尔多瓦—南京论坛”于2009年12月15日至16日在高研院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学批评:思想危机,思想的危机?”。来自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三大、阿尔多瓦大学的12名学者与南京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海外教育学院的14名教授就文学与历史、作家与知识分子、生态批评、文化身份、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现状、理论的危机和对理论的抵制、翻译批评的精神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交流。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也参加了此次论坛并与学者们进行了交流。此次研讨会还特别开辟出一个“博士生论坛”,为成长中的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切磋的平台。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学院顾明栋教授来访

2009年12月18日,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学院顾明栋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的名家讲坛讲座,受到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名家讲坛

黄帝自巴比伦来

——中国人种西来说及其传播

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 孙 江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其名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起源》的著作中，撰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散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s)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裔出巴比伦，中国人(汉人)的祖先原来是巴比伦人。这就是所谓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的“西来说”。

在欧洲汉学历史上，虽然有关中国文明“西来”的议论始终不绝其

声,但拉克伯里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汉学所首肯。意味深长的是,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东传至亚洲后,在日本和中国却获得了不少知己。1900年,两位日本业余历史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重德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写入面向一般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书中。这本普及读物是明治日本众多关于中国历史著述中的一本,不能代表学界主流的看法,然而当1903年其转述的“西来说”被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却在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时不但附和者众,甚而还进入传播公共知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中。

随着1920年代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和相关研究的开展,“西来说”在考古学界重新成为一个话题,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亦不时为人提起。此说既已流传开来,俨然成为讨论中国古史时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这段公案,缪凤林曾痛加批判,以“疑古”著名的学者顾颉刚也颇表怀疑。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展开,1929年,何炳松、金兆梓等学人又竞相对其加以批驳。绝大数中国学者不但直指拉克伯里“西来说”之荒诞,还异口同声地讨伐清末转述西来说的蒋智由等人之过,这样,大概在1930年代中叶,“西来说”便从中国历史叙述中销声匿迹了。

时隔一个甲子,在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起源的讨论中,“西来说”再次成为学人热议的话题。清末知识人何以借助“西来说”这一象征符号来营建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孙隆基认为,清末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黄帝”和“支那”分别来自日本。石川祯浩具体考察了日本资源——围绕黄帝出身和肖像——在黄帝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他的观点对中国和美国同行有很大的影响。杨思信和李帆介绍了拉克伯里“西来说”在清末中国传播的概况。最近又出现了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吉开将人把汉族“西来说”与苗族“先住说”结合起来讨论多民族史观在中国之形成问题。吉开的研究在西来说的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西来”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其内涵还需与“本土”——“先住之民”放在同一历史语境中考虑。相比之下,韩子奇(TZE-KI HON)在其新近刊发的论文里考察了拉克伯里学说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流传的概况,着重解释了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想象自我的问题,指出中国人对“西

来说”由附和(1900年代)到反对(1930年代)的变化表明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历经了从时间等级序列到空间等级序列的转变。

在上述论著发表前后,笔者有关近代中国历史记忆和认同之形成的研究也涉及到“西来说”。围绕“西来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今天学者不屑一顾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西来说”传入中国过程中日本的中介作用具体如何?清末民初知识人何以关心“西来说”?或曰在不同的文本中“西来说”被赋予了怎样的内容?在方法论上,笔者尤其难以苟同的是,以往几乎所有研究在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性的同时,均以本质主义的方法将“西来说”纳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直线时间序列中,从而低估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简化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比如,1992年出版的冯客的《近代中国的种族话语》一书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该书关于近代中国种族知识生产之观点,我已另文予以批评,就拉克伯里“西来说”流传至汉语世界的契机而言,几乎所有后来的著作都沿用了他的看法,即从拉克伯里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起源》到白河和国府的《支那文明史》(冯客译为“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再从《支那文明史》到《新民丛报》连载的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基于这些理由,在以下的篇幅里,本文将首先全面概述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主要内容,继而重点追溯明治末/清末“西来说”在东亚——从日本到中国——的流传过程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呈现和不同意义之问题。

广为人知的拉克伯里的“西来说”来自《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在该书导论中,拉克伯里称:“历史科学”(science of history)的发展已经显示,所有已知的事例都表明文明的中心发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贸易导致了文明的扩散。在吸收了欧洲刚刚兴起的亚述学(Assyriology)成果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公元前23世纪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假说。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共418页,除导论和附录外,分为12章。该书不似研究论著,更像读书札记,网罗和举证了大量文献,引文远比正文要长。该书主要内容取自拉克伯里1889—1894年间发表在《巴比伦与东方记录》上的论文。他首先介绍了中国语言和书写的特

征,接着他宣称自己通过多年运用“近代语言科学”(modern linguistic science)的方法,发现了从未被探讨的领域:古代汉字和 Akkadian 和 Susian 语的联系。在举证了中国文化和迦勒底亚文化(Chaldean culture)的联系后,拉克伯里提出了黄帝身份问题。在汉语里,Hoang - ti 最早读音为 Kon - ti,根据中国的历史传说,黄帝家族姓 Nai(原本为 Nan 或 Nak),如果进一步检索中国古代文献,则来源于 Nak - kon - ti,黄帝的名字与 Susian 文本中作为诸神之首的 Nakhunta 或 Nakhunte,存在着令人吃惊的一致。原为 Susa 王的 Kudur Nakhunta 来到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在大约公元前 2285 年建立了国家。按照这种比附手法,仓颉(Ts'ang Hieh)、炎帝、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可以在巴比伦文明中找到联系。最后,拉克伯里呼吁英国政府加强对东方语言研究的资助,“在所有东方国家中,保持对中国及其未来的关注,对英国来说有莫大的利益”。这个讲演提出了其后拉克伯里“西来说”的轮廓。

拉克伯里是从语言、文献和文物三个角度来论证“西来说”的。在其论著中,他不无自信地表示自己使用的是“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当时英国学界盛行一时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促使这种方法流行开来的是有关巴比伦的研究——亚述学(Assyriology)。实际上,在论证“西来说”时,拉克伯里大量引用了亚述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他的支持者 Sayce 爵士的成果。翻阅《巴比伦与东方记录》可知,这份杂志周围聚集着一批研究巴比伦、中国和印度等地文明起源的学者,中国文明西来说在这些人中应该是一种共有的知识。拉克伯里通过这份颇具个人色彩的杂志,推动了证明中国文明西来的研究工作。

如果将西来说仅仅看成是拉克伯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与亚述学对话的产物,那显然将 19 世纪欧洲的汉学研究简单化了。其实,拉克伯里西来说最重要的学术源头是汉学(Sinology),也即后来日本学者所说的“东洋学”。

一般认为,欧洲关于中国文明的“西来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意欲通过天主教历史与中国历史的附会调和,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找到合法依据。前揭韩子奇文提到,法

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关于《易经》是上帝的数学符号这一说法,对拉克伯里产生了影响。18世纪的法国曾兴起过中国文明源自埃及的“西来说”,拉克伯里的论证方法确实很像其代表人物 Joseph de Guignes。但是,阅读拉克伯里的著作则不难发现,早在他之前,即19世纪40—60年代,法国汉学界就普遍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了:Dr. J. Oppert 讨论了巴比伦文字与汉字的关系, Francois Lenormant 关注汉字与埃及文字的关系, G. Chauthier 等人则关注汉字与埃及、巴比伦文字三者之间的关系。拉克伯里直接从这些研究中得到了启发。

此外,尤其不能忘记的一个人是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拉克伯里对艾约瑟多有忌讳和批评,但显然受到了艾约瑟的“西来说”的影响。艾约瑟不但早在1871年就出版了专著,从语言上讨论中国语言与西亚语言的关系,甚至明确声称,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中国人从Mohammedan Tartary移居甘肃和陕西,在黄河西部建立了殖民地。其后,他又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连载文章,论证汉语语言和希伯来语之间的联系,还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刊文讨论巴比伦文字与汉字的关系。不过,艾约瑟与拉克伯里不同,他强调人类东西语言之间的共同性,而不是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黄帝的身份,拉克伯里将中国文献的记载当成历史事实,并与巴比伦的出土文物相比附,建构了黄帝率领巴克族从巴比伦来到中国的故事;艾约瑟则以“初不载于书诗(《尚书》和《诗经》——引者)”而质疑黄帝的真实性。

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拉克伯里的西来说,虽然受到了理雅格和施列格等人的批评,而不为汉学界所接受。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这些人同时又是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宣传者。如,拉克伯里在书中对其表达过谢意的达格拉斯(Douglas),在其错误百出的汉语手册《华语鉴》导言中声称,中国人在大约公元前2300年带着巴比伦文化知识从西南亚移居到中国,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和施列格一起编辑《通报》的高第(Henri Cordier),在拉克伯里生前即将其西来说作为一家之言加以介绍,在拉克伯里死后也是不多的几个宣传西来说的汉学家之一。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几乎无人问津之际,

高第在回顾先前研究时仍不忘提及拉克伯里的西来说。高第在修订曾经支持并且帮助过拉克伯里的 Yule 的名著中添加了有关西来说的内容。

然而,1894 年拉克伯里突然去世后,他主编的《巴比伦与东方记录》立刻失去了凝聚力,在勉强支撑了数年后,这份杂志终于在 1900 年停刊了。这似乎象征着,拉克伯里生前孜孜不倦推动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已经逐渐成为历史。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周晓虹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两个互为交织的基本议题。这两个议题所以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发生在 1980 年代后的社会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共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全球化凭借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得以使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表现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或推广开来;而作为一种历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社会转型以市场转型为前导,继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迁。其实,与其说社会转型是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不如说正是发生在中国以及苏东等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场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铺平了道路。进一步,就本文将讨论的主题而言,正是社会转型导致了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事实,又使得这一变动不能不

受到全球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变动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作为阶级关系或社会结构变动之结果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成长,自然也只能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获得全面而真实的解读。

尽管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出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它都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并且,不仅中产阶级的存在早期主要限于欧洲和美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即使在这些国家中,中产阶级也不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存在。比如,以 18 世纪的法国为例。众所周知,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源自那个在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虽然同教士、贵族即所谓第一个第二等级相比,第三等级数量庞大,占到法国人口总数的 97%,但其中真正能够称作“中产阶级”即法国人所说的 the petty bourgeoisie 的,却不过 10%—15%,其中包括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小店主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和公务人员。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结构现实,富有洞察力的马克思在承认中产阶级存在的**同时**——事实上他也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还是干脆地将整个西方社会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在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两大因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一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其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即所谓全球化。

就第一个转变而言,它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到中产阶级本身的形态变化:早期的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即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所谓“老中产阶级”——逐渐让位于为大资本或国家服务的从事脑力劳动的“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最初引起关注,是在 20 世纪初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采用了古斯塔夫·施穆勒的观点,将越来越多的公务人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称之为“新中产阶级”;由此,他修正了马克思有关阶级的极化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